

浙江地方文化丛书

主编：张全镇 吴茂云

# 嘉善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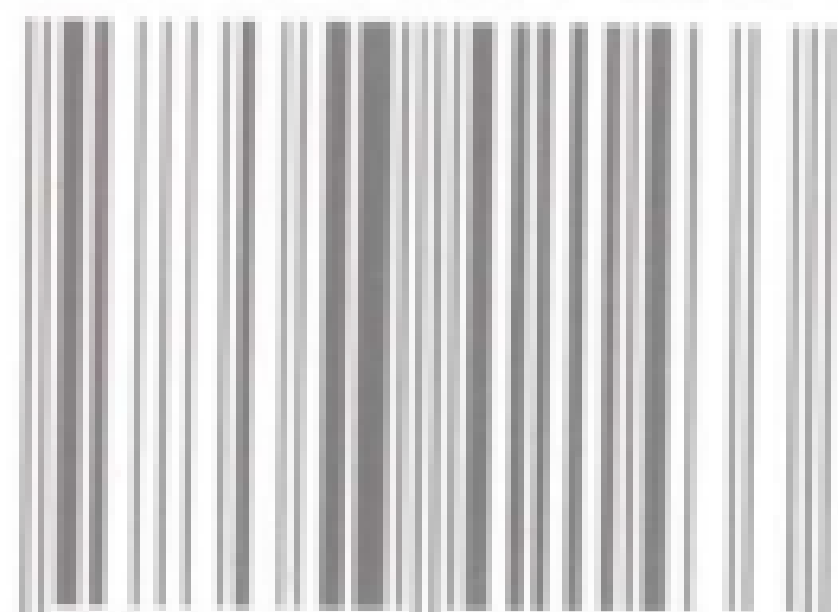
丛书首席顾问：翟翥武

责任编辑：许水涛

封面设计：龙翔



ISBN978-7-5034-2143-3



9 787503 421433 >

总定价：189.00 元(全四册)

# 嘉定州志

宋 陈耆卿 纂

中国文史出版社

# 陈耆卿与《嘉定赤城志》

楼祖民

《嘉定赤城志》是南宋时期章安人陈耆卿主纂的一部台州总志,全志分地理、公廨、秩官、版籍、财赋、吏役、军防、山水、寺观、祠庙、人物、风土、冢墓、纪遗、辨误 15 门,共 40 卷。《嘉定赤城志》去取精当,简而有体,凡例严辨,文笔凝练,是现存台州诸多方志中承上启下、最具特色的一部志书。历代都尊为名志。

## 一

关于陈耆卿和《嘉定赤城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这样记载的:

耆卿字寿老,号笈窗,台州临海人。登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国子司业,其事迹不见《宋史》,惟谢铎《赤城新志》稍著其仕履,而亦不详。今以所著《笈窗集》考之,则嘉定十一年尝为青田县主簿,嘉定十三年为庆元府学教授。又赵希弁《读书附志》称耆卿《集》中沂邸笺表为多。案《宋史》,孝宗孙吴兴郡王柄,追封沂王,其嗣子希瞿,宁宗尝立为皇子,即济王竑。耆卿必尝为其府记室,而希弁略其文也。此为所撰《台州总志》,以所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条分件系,分十五门。其曰赤城者,《文选》孙绰《天台山赋》称:“赤城霞起以建标。”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序》曰:“往天台尝由赤城山为道径。”又引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又引《天台山图》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门也。梁始置赤城郡,盖因山为名。”耆卿此志,即用梁郡名耳。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具有师承,故叙述咸中体裁。明谢铎尝续其书,去

之远甚。旧与耆卿书合编,今析出别存其目。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志之前有图十三,此本乃无一图,殆传写者艰於绘画,久而佚之矣。

综合考证相关资料,陈耆卿的基本情况如下——

陈耆卿,字寿老,号筓窗,章安人,迁居临海巾子山之麓。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出生,“八九岁学属文,十二岁入乡校”,不但才华出众,又特别好学,因而深受乡贤前辈的瞩目。

陈耆卿年青时仰慕永嘉学派开山祖师“水心先生”叶适的学问,负笈投师。叶适初读其文,即赞赏有加,读至佳处,不觉“惊诧起立”。其时,叶适“以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耆卿,即倾倒付属之”。只是叶适对陈耆卿的过分赏识,使他身旁的人大都不服气,而叶适则独具慧眼,坦诚地说:“耆卿能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综合欧、苏,自成一家,他年成就不可估量。”在乃师的熏陶下,陈耆卿学业大进,很快就成了叶适的入室弟子。学成归里时,叶适赠诗云:“古今文人不多得,元祐唯四建安七。性与天道亦得闻,伊洛寻源未为失。”陈耆卿终于没有辜负乃师的期望,十数年后,已“卓然为学者宗”。

嘉定三年(1210),台州知府黄罈聘陈耆卿编修府志,以陈维助之,一年后草稿成,因黄改知袁州而未果。七年(1214),陈耆卿得中进士;十年(1217),授青田县主簿;十三年(1220),升庆元府学教授,不久改任舒州教授;复为沂王府记室。十六年(1223),齐硕任台州知府,复延陈耆卿为统纂,姜容为主事,蔡范、陈维、林表民等为编辑,重修府志,经半年全书告成。同年,天台林师点、林表民父子所纂大型地方历史文献《天台集》第一辑刊行,收录上至先秦下至南宋有关人物对天台的题咏,陈耆卿为之跋。《天台集》前后用40年时间,至淳祐十年(1210)方才告竣,是为台州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

宝庆二年(1226),陈耆卿入京应馆试,任秘书省正字,转任校书郎。由于他为官刚直耿介,不作谄媚之文,敢于犯颜触讳。曾陞对《失人心》一疏,宁触忌讳而不顾,因而受到先后在宁宗朝任相17年和在理宗朝任相9年的权相史弥远的压制,长期滞于馆职。绍定元年(1228),陈耆卿除秘书卿;三年(1230),为著作郎;端平

元年(1234),兼国史馆编修,迁将作少监,终国子司业。陈耆卿卒于端平四年(1237),一说卒于端平三年(1236)。

陈耆卿博学多识,不但长于史学,亦擅词章,理学尤为卓著。生平著述丰富,主要有:《论语纪蒙》18卷、《孟子纪蒙》14卷、《嘉定赤城志》40卷及《笈窗初集》、《笈窗续集》数十卷。《论语纪蒙》和《孟子纪闻》二书都由叶适为之作序。据宋人书目著录,其所著之《笈窗初集》计30卷,《笈窗续集》计38卷,到了南宋末年时已多散佚,明初收入《永乐大典》,清乾隆间采入《四库全书》。现在传世的10卷本《笈窗集》,即以《四库全书》为底本,由清临海叶氏荫玉阁刊刻于光绪二十年(1894),前有嘉定六年(1213)寒食节陈耆卿自序,后有淳祐四年(1244)上元日吴子良跋;内中论文仅131篇、诗38首、词4首,编为10卷,与原作数量相比,“所存仅十之一二矣”。今温州图书馆有《笈窗集》10卷藏本,为清瑞安学者孙鸣锵抄本。

## 二

说起一代名志《嘉定赤城志》的编纂,还很有一些波折。

先是在南宋淳熙年间,台州知州尤袤以及唐仲友,都曾有心于此,但都因故而没有实施。稍后的李兼于开禧年间来到台州任知府,亦有心于修志,但由于在任时间太短,仅一年半即卒于任,尚未着手,已归道山,亦未遂愿。两年后黄嚈知台州,他一到任,即以修志为首务,聘请陈耆卿和陈维共当其责。大约花了一年多时间,初成草稿,不料黄嚈又改知袁州,这事就又搁了下来。一直至十余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齐硕来守台州,才又重新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于嘉定十六年(1223)春夏之交复行纂辑。此次再起炉灶,仍由陈耆卿为统纂,聘姜容为主事,由蔡范、陈维、林表民等分头负责采益增订,花了约半年时间就全书告成。

《嘉定赤城志》原刊本已佚,《读书丛录》云其为大字黑口,半页10行,行20字。《郡斋读书记》云其尚有图12幅。明弘治十年(1497)郡人谢铎在纂修《赤城新志》的同时,重刊此书,此本称“弘治本”,亦半页10行,现仅台湾有藏本,南京图书馆等有残本。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和万历二十四年(1596)及天启六年(1626),

台州知府毛术、简继芳和推官吴善谦等先后三次修补“弘治本”重刊。现“嘉靖本”已佚；“万历本”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有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残本；“天启本”则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那内阁文库有藏本。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据两淮马裕家藏抄本收入。现在社会上的通行本则系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临海宋世荦重刻的《台州丛书乙集》本。

宋世荦重刻《嘉定赤城志》时，明代所刊各本已很难见到，在临海，仅洪颐煊和郭协寅两家藏有残本，他们两家互相影抄，各成全帙。宋氏又从两家借出，经校对后刻以行世。此书的宋刻本有图12幅，而宋氏清刻本已缺图3幅，仅9幅。

中国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地域文化载体。西方没有地方志，受中国影响很深的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也没有地方志。编修地方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的地方志是研究中国古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国外的汉学家称中国的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要研究人类文明，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

什么是方志？方者，地方也；志者，记载也。方志，顾名思义，就是一方之记载。它是一种以记载一方之人、一方之事为内容的著作。它的基本特征有两条：从空间上说，它以一个地方为对象；从内容上说，一地的历史，都在它的记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方志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是综合性国史在地方的延伸，地方性、综合性是其根本特点。

台州的编志同样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如三国前后面世的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是最早记述临海郡境内的习俗和物产方面的方志；六朝刘宋时期孙诜所撰之《临海记》，这些都是现存不可多得的雏形方志。到了宋代，方志编纂已趋成熟，后世所谓方志，即是指宋以后方志而言的。宋代是我国方志体例的定型期，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内容上，宋代方志的重点开始从地理转到人文历史方面；在形式上，图经逐渐被志代替；在体例上，几种代表以后方志发展主流的体例，如门目体、纪传体，日趋明朗。宋朝方志编修，已经遍及全国各地，“郡县必有志”。陈耆卿就是在这一编志的鼎盛时期完成《嘉定赤城志》这一名志的。明代陈相称赞这一

部志书“事实详明,颠末备具,千百年之文献一览可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俱有师承,故叙述咸中体裁。”

陈耆卿不但文笔好,又谙经济之学。他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和优点,同时又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在陈耆卿自己看来,编著《嘉定赤城志》的责任,不仅仅是为了述沿革、记故事、明旧迹、举人物而已,主要目的还是要寓教化于其中。陈耆卿在自序中说:“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析之于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识典章,非直为纪事设也。”用意之深刻,态度之严谨,已自了然。

陈耆卿编著《嘉定赤城志》的“微言大义”,在志内随处有所体现。如“寺观门”开首云:

“自佛老氏出,摩荡掀舞,环一世而趋之,斯道殆薄蚀矣。粗之为祸福,使愚者惧;精之为清静寂灭,使智者惑。盖其窃吾说之似,以为彼术之真,如据影搏物,而熟视之则非也。以故台之为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庐道宇者四百有奇,吁,盛哉!……今备录之,非以滋惑,亦使观者知彼之盛,而防吾之衰,庶少以补世教云尔。”

又如“山水门八·水利”的开首云:

“迁书《河渠》,固志《沟恤》,得不以水利吾民之命,不容不备录之欤!每念古郑白之俦,出意疏凿,有以一渠而溉田千顷者。接于近世,非惟不能图新,而并与其旧失之矣。台虽号山郡,所在陂塘良众,顾以豪吞富噬,日湮月磨,每岁邑丞汇申,按败纸占名惟谨,何识兴坏。以故甫晴虞旱,方雨忧潦,盖人力不至而动责之天,宜其少乐岁也。余按搜旧畎,特揭一门,庶使后之有志者可按图而得之焉。”

毫无疑问,陈耆卿这种明志有用、存实存真的编志思想,永远值得后人去借鉴。

《嘉定赤城志》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它的本身,对后世的编志,特别是对其后台州各代的编志,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明清台州的方志学家是没有一个不受到陈耆卿和《嘉定赤城志》影响的。清中期的宋世荦就赞曰:“积十数年参考之功,创千百载遗缺之迹,词旨博

贍,笔法精严,称杰构焉。”晚清的王棻也说:“陈《志》事立之凡,卷授之引,词旨博贍,笔法精严,繁而不芜,简而不陋,洵杰作已。”

### 三

在十二、三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崛起于南宋经济中心的浙东学派,是与理学、心学鼎足而三的一个独立学派,提倡事功经济之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繁琐议论,其代表人物叶适、陈耆卿等“独有忧世之心”,论述现实政治并提出其改弱就强的方案。

早在开禧二年(1206),叶适就上书,建议“修实政,行实德”,主张“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次年,叶适提出在两淮险要地方建立堡坞,以安集流民,固守两淮,并亲自建成定山等三个堡坞而被夺职。叶适一生重教兴学,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己任。罢职还乡后,尝寓居临海、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人曾在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以纪念。

叶适的学生中,最受赏识的是陈耆卿。嘉定十年(1217)到十三年(1220),陈耆卿任青田县主簿时,因青田是永嘉邻县,他曾多次到温州向叶适问学受业。他第一次上书叶适时说:“窃窥先生之学,千载一朝,尧、舜、禹、汤、周、孔之道,赖以勿替……闻所著述有曰《习学记言》者,天下学子争师诵之,期与古圣同一不朽,而耆卿则未也。今日之来,惟提耳以告焉。”陈耆卿带着他的著作《笈窗初集》与《论孟纪蒙》向叶适求教。叶适为他写有《题陈寿老文集后》、《题陈寿老论孟纪蒙》等文,对他的文章甚为赞许:“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睹,盖未易以常情限也……君之为文,绵涉既多,培蕴亦厚,幅制广而密,波游浩而平。”

陈耆卿继承乃师衣钵,在政治思想、哲学主张和实际行动上,都与叶适同调,主张“经世”、“事功”,还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进行了突破性的否定,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与“工商皆本”的观点。

“重本抑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商鞅“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韩非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韩非子·五蠹》);发展到唐代崔融“不欲扰其末”(《全唐文》卷219)、白居易“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白香山集·礼部试策第一道》)。至南宋叶适首举反对大旗,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他说,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同时,对“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旧规提出批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陈耆卿在叶适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天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符穡;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说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访录》提出“工商皆本”早了近六百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和十分重大的意义。

陈耆卿是古代经济学的奇才,他对货币流通的研究尤为透彻。

我国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进入宋代后,一方面,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的现实,加剧了货币流通的内在矛盾,钱荒成了宋代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于是推出了“会子”(即楮币、纸币)。

南宋宁宗时,铜贵钱贱,铸钱赔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铜要千里运至,需脚乘之资、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加上铸钱时纯铜外流,重六斤的一千文钱铜的含量一般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在青田县主簿任上,陈耆卿就专章奏议铜钱外流问题:“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

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

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针对会子驱逐铜钱现象，为稳定币值，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历史上被称为“称提之术”；陈耆卿在《奏钱楮疏》中还提出了涉及发行准备金、发行限额、金银买卖、钞币渠道、昏钞倒换、惩治经办官吏营私舞弊以及伪钞惩罚等的意见，建议朝廷“自守成法”，维持信用，以保证纸币的正常流通和币值稳定。这说明了陈耆卿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楮币的创行，使中国荣膺世界最早行用纸币的国家的的美誉，对纸币在全世界的行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宋代行用楮币给后人提供的经验教训和陈耆卿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世事功、为民请命，是陈耆卿的信念和一贯做法。在任庆元府学教授、舒州教授、沂王府记室时，陈耆卿就曾数次上疏言事：奏请治奸民诬告；论兴修水利是州县急务；请严格执行推排法以抑制大姓而有惠于小民；论“和采”是“名虽和而实则强之，病在胥吏之奸”等等，均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和水利，陈耆卿更为重视。他在《笈窗集》卷四《奏请急水利疏》中对水利与农业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比喻：“水在地中，犹人之有血脉”。“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他不仅强调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而且把水利提高到社会意义上来认识。他在《社稷神祝文》写道：“县令八品官尔，有社稷焉，读诗至《载芣》，则知祈年古矣。祈之春，固将报之秋也。青阳氤氲，千耦如云，神其玉之，食我农人。”

#### 四

正是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主张作背景，陈耆卿所纂的《嘉定赤城志》才会高人一筹。就连有些在当时看来属于很一般的材料，但对于后世而言，对于我们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和社会而言，意

义却非常重大。如《嘉定赤城志》卷五的“漏泽园”就是一条这样的材料,兹录如下:

“漏泽园,在城东法安院侧。初奉旨建,嘉定四年(1211),黄罍守重新之。先是,地止三十余亩,守以僧行力不任,近舍有民王姓者自为之守,四缭以墙,其后屡坏,民死皆道攢路蹙,过者恻焉。黄遣于东西南三隅,比城五里,循古城根、山宫梅花园、后岭、麻车衙等处,括遗骸一千五百余,乃先葺旧园,且求园外地及威神院侧、后岭庵三所,置新园,永为邦人聚葬之地焉。”

本条下夹注云:

“旧园内立墙,墙内分为若干层,层分为若干穴,自东取西,或自南取北,每穴地广七尺,修一丈,比葬,掘深五尺,每三层横穿一沟,沟广二尺,深六尺,仍相一低处笕沟水出溪,约可瘞一千五百四十八人。余三处可瘞二千五百人。有地而无力者,官量给其费;宗室命士,大五千,小三千;余则大三千,小一千五百。俗尚火化,有谕而不格者,亦助之钱,钱稍下于瘞。已化而愿以灰骨葬者,听。其暴露无主者一百七十余人,棺损者易之,瘞于旧园,如前式。”

这是一条记录宋代“公墓”方面的材料,其中价值特别高的是,它告诉我们,台州至迟在宋代就已“俗尚火化”,尽管当时官府不提倡,还告谕禁止,但百姓还是多仍其旧,火化如故。当时的官守也很开明,对火化者依旧资助一定的丧葬费用,只是稍少于土葬。由此可见,台州在古代就有“俗尚火化”的优良传统,它对于我们当今所提倡的移风易俗和殡葬改革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陈耆卿所纂的《嘉定赤城志》中极具价值的史料比比皆是——

如宁海县有关人士在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五上发现了以下记载:

“九顷塘,在(宁海)县西四十里,包山吞麓,其浸九顷……有金银鲫鱼,味绝美,然有渔艇则覆焉,其神异多此类。”

该县有识之士遂建议当地政府挖掘金鱼资源,开发旅游项目。目前,位于宁海岔路的九顷塘已开发成旅游度假区,并每年在荷花盛开的季节举办“宁海金鱼节”。

又如牌坊。牌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它由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里或坊的大门演变而来;在近代,牌坊更是作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使者,漂洋过海,在世界不少城市均有修建牌坊之举。据笔者掌握到的资料看,《嘉定赤城志》所记的黄岩牌坊是目前记录最早的牌坊。《嘉定赤城志》载:北宋熙宁九年(1076),黄岩始建清镇、钦贤、仁凤、新罗四座牌坊。《嘉定赤城志》所附黄岩县志图中可以找到清镇、钦贤、仁凤三坊,图中均画出了牌坊的形状,树于巷口;新罗坊因在县城东一里,故图中没有绘入。据说《吴县志》里记载,吴县境内有14座牌坊均为宋以前所建,即比清镇、钦贤、仁凤、新罗四坊又早了100多年,但由于未有证据说明其修建年分,且这14坊到底谁先谁后亦无考,只好在此存疑了。

再如宣纸。造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东汉蔡伦发明“蔡侯纸”,到东晋有了藤纸,至隋代产生了楮皮纸。而纸的经典诞生在唐代,这就是宣纸。按加工方法分类,宣纸一般可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生宣吸水性和沁水性都较强,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变化;熟宣是加工时用明矾等涂过,吸水能力弱,使用时墨和色不会洇散开去;而半熟宣,吸水能力介于前述两者之间,“玉版纸”即其代表。

现在大家知道的观点是,安徽省泾县是宣纸的原产地,也是“玉版纸”的故乡,宋代在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等地就大量生产这种纸。

其实,黄岩的造纸业在唐代就极负盛名。在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所著的《书史》里,记载唐文宗李昂手诏,称赞黄岩藤纸:“以台州黄岩藤纸捶熟,揭其半用之,滑净软熟,卷舒更不生毛。”北宋年间,黄岩更有“玉版纸”闻名天下。据苏轼的《东坡杂志》记载,名士吕献可曾对苏说,天台(台州)玉版纸质优,超过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澄心堂纸。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记载:“今出临海者曰黄檀、曰东陈,出天台者曰太澹,出宁海者曰黄公,而出黄岩者,以竹穰为之,即所谓玉版也。”明代中叶黄岩《万历县志》说,优质的藤纸,产于西部山区。清代乾隆末,临海宋世荦的《台郡识小》亦记载黄岩产藤纸。但清中叶之后,玉版纸与藤纸不见记载;至清末,黄岩造纸一落千丈。

又如我国最早的茶叶专著《茶谱》,宋代王端礼撰,约成书于宋元符三年(1100),原书已佚,内容不详;《茹芝续谱》宋代桑庄撰,

约成书于宋嘉定十六年(1223),原书亦佚,然因陈耆卿《嘉定赤城志》之辑录而尚存百余字,弥足珍贵。

另外,“医院”这一名称也最早出现在陈耆卿的著作中。据史载,在宋理宗宝庆年间,“医院”作为疗疾机构的名称已开始出现,现保存在苏州的宋朝石刻《平江图》中,就有一古式房屋图样,上镂“医院”二字。陈耆卿在其所写的《安养院记》中记载:“安养院在州(指苏州)铃厅后,旧名医院,宝庆中改今名。”这是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实证可考的最早出现的“医院”这一名称。

## 五

宋元时期,学术派别林立,文学流派纷呈。在南宋后期,文学和学术的流派分野大致是:朱熹道学一派有他们的文学主张,也有文学实践,其代表人物有魏了翁、真德秀等;有意与他们对立的有叶适永嘉学派和他的浙东文派,由他推奖而兴盛的“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以及继“四灵”而起的以刘克庄、戴复古为代表的“江湖诗派”;陆九渊心学和与他有着天然亲密关系的以吕本中、曾几为代表的江西诗派。

浙东文派在南宋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陈耆卿,他既有理论,也有实践。陈耆卿曾批评当时为文诘屈聱牙的学古之风说:“然天下之至显者理,而凿之者晦,至近者事,而隔之者远,至和者情性,而挠之者不平。惟不平,故不正。于是以粹易明白为陋,而以诘屈聱牙为古焉。夫古非诘屈聱牙之谓也,而学古者持之不置,至镌炼琢削以求之。求益工,见益左,盖彼自谓其能为尔,讵识所谓不能不为者哉!”指出为文“掀波骇浪,不如安流;峭岸孤峰,不如平陆”,“癯之中贵有腴,平之中贵有味,约之中贵有度,直之中贵有体”,提倡“囿巧于朴,而寄勇于闲暇,辞之所至意亦随之”。陈耆卿以提倡清新圆熟来反对江西派的诘屈聱牙、碴研粗硬,以提倡辞至意随、抒发一己之情来反对理学派的以诗明理。

观陈耆卿之《笈窗集》,其篇章旷而清,其铭碣典而润,其记序婉而富,其笺翰妥而熟,是对南宋后期文、理割裂造成的文弊的纠偏,也是对走向“奇诡浮艳”的道学文弊和堕入魔趣的宋末“太学文体”的批判。其弟子吴子良在《笈窗集跋》中用三句话概括陈耆卿

为文：“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复赞其“落笔惊豪隼，辞驶若流水，盖天下诵之矣”。

陈耆卿留存下来的诗词作品不多，一共才 42 首，但其诗作崇尚唐音，清新圆熟，险不流怪，巧不入浮，含蕴丰富，情韵深长。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类，它直接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歌咏题材，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某种议论或见解。陈耆卿的咏史诗决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借咏史以讽时，义理、辞章兼重。如赞扬禅让王位、冒死而谏、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说这两个人有骨气、有立场，坚持了原则，保持了气节。其《夷齐咏》云：“商道昔波荡，周王纲九围。二子如冥鸿，翩然独高飞。周粟固可耻，薇亦周之薇。云胡挟孤愤，了不悟众诽。天地有正气，日月无斜晖。惜哉权一字，谬误无已时。武德纣之虐，贤者诚知之。为欲扶此教，之死不原违。吁嗟臣道薄，千载常凄其。欲上西山望，草际露未晞。”又如《咏史二首》：“沛公家业本无能，休责渠曹不治生。看取帝王他日事，方知俗眼未分明。”“赤族诚非汉道洪，违时贾祸亦缘公。最怜老却从陈豨，不道先曾辟蒯通。”再如颂扬孔孟的《和芥庵韵》：“孟轲谈一本，孔子号无我。圣贤超警趣，不作流俗堕。故能贯堪舆，中立而不颇。黄冠宗无为，衲子只打坐。言若高峭甚，又与圣贤左。须於真实处，大海稳扶柁。须於疑似间，曲户牢着锁。世道震遂泥，人心履俱跛。竞作夔怜蚘，徒劳螟祝蠃。芥庵之心镜，渊珠光彻颗。常时足欢娱，此日类坎轲。乃能贞其颐，不为名利杂。敲棋声落枰，哦诗气摧垛。此外澹一视，泰山如草蓼。未妨师孔孟，匪涉佛老情。汨余抱孤戇，匪惟繁庸琐。涉世虽云阔，诣理犹未妥。正性水下月，邪焰风中火。因子当自强，朝闻夕死可。”抒发自己要自强不息，努力向圣贤看齐，朝闻道则夕死可矣的精神风貌！

陈耆卿平生体恤百姓疾苦，其诗歌也多同情民生之作。如《种麦》：“新谷未升陈谷罄，宵人托麦以为命。今年种麦如去年，去年满怀今空田。吁嗟皇天毋乃戾，去年浙右当死岁。湘中死寇淮死兵，留得东州仅旒纆。只今艰食遽如斯，岂是造化有乘除。我无一语话四海，对之泣下泪沾裾。催租官吏如束湿，里正打门急复急。安得君眼如月长，灼破田家蓑与笠。”再如《闻湖寇》：“淮上兵戈血

染川，浙河饿莩骨盈船。又闻寇盗湖南起，不觉迟回夜半眠。食肉贵人无恙否，剥肤巧吏尚依然。吾皇圣德如天大，谁采吾言作奏篇。”

陈耆卿写景咏物清新圆熟，巧而不浮。如《丹桂三首》：“千古陵阳芳桂丛，凌风擎出蕊珠宫。渥丹自是天然质，不学桃花点注红。”“春兰愧死菊羞黄，世上龙涎不敢香。独有含香人晚步，搯筇一笑倚斜阳。”“露沐烟梳冉冉时，朗然新月似蛾眉。傍人尽向天边觅，不信蟾宫在树枝。”又如《过龙潭澳》：“久阔松楸信，因为龙澳来。四山黄恋叶，一水绿澄苔。地旷樵声出，天寒雁影回。无人且无酒，清坐兴悠哉。”再如《东郊》：“要拓郊原眼，短筇扶我东。秧寒针怯水，麦熟浪酣风。古寺荒烟外，孤禽落照中。得醪嫌独醉，犹及灌园翁。”《似村》：“缚茅本不傍孤村，尽日焚香深闭门。陌上红尘高没马，谁知巢父个中存。”

陈耆卿之杂诗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如《闲居杂兴六首》：“我不学楚人，滋兰以自馥。亦未羨东陵，种瓜以混俗。富贵自有时，贫贱宁可欲。达则济四海，穷则独善足。”“稷契不明经，伊傅不决科。方册镌勋名，千古光不磨。百年等一死，自立须嵯峨。啾啾候虫鸣，辛苦如之何。”“墙西几笕笋，我昔手所种。年来饱风露，锦绷纷错综。种善如种竹，此语全擎诵。眇然方寸间，仁不可胜用。”“万花逐流水，一往不复回。昨日栏中花，今晨安在哉。焚香心如冰，未受寒暑催。赠花以片言，自落还自开。”“狂飙卷春去，永日送夏来。天地一剧戏，役人如婴孩。借使长青春，人生能几回。仰羨松心坚，雪里常崔嵬。”“炉烟上疎棂，闭户白日静。尧舜亦人耳，万善吾所性。纸上空支离，言外独辉映。一笑千载宽，此乐无终竟。”又如《夜坐》：“空庭杳已夜，孤坐悄无言。雨后山疑活，云中月欲吞。清愁难独遣，古意与谁论。听罢琴中操，呼童早闭门。”

陈耆卿为诗，反对碴砑粗硬和奇诡浮艳，而直抒一己之胸臆。其《题汤正仲墨梅》云：“闲庵笔底回三春，平生爱为梅写真。只今龙钟已八十，双瞳挟电摇青旻。芒鞋辙迹半天下，学语儿曹读君画。孤根踞铁几经年，转作平梢月倒挂。我家破屋同蜗牛，素壁悬来春复秋。试携纤练觅天巧，门外观者何其稠。真花著雪苔枝愧，君为描摸应添瘦。朝开暮落春不留，岂若墨本堪不朽。临风静玩

意趣长，何当烂熳挥满床。孤山老人醉中见，便欲信手赋暗香。”又如《春日书怀》：“闲来情思浩无涯，徒倚东窗日未斜。乍雨乍晴莺唤柳，不寒不暖蝶穿花。读书有味慵拖杖，觅句新成自煮茶。未必贵游知此趣，乘除合付野人家。”

诗要讲究意境，但意境绝不仅仅是对风花雪月的描写，而是指对万物敏锐而准确的洞察力所带动的喜悦气氛。如陈耆卿的《和黄临海咏雪》：“剪水纷纷扑面来，须臾洒满旧琼台。今年不用笺丹极，闻说金穰百室开。”又如《与二三友游天庆观》中的“月翻杨柳尽头影，风擢芙蓉闹处香”和《挽陈知县》中的“日边消息花争闹，露下光阴柳变疏”等诗句，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可谓着一“闹”字则意境全出矣！

陈耆卿留存下来的词虽只有4首，但写得丽逸委婉、韵致翩翩。如《鹧鸪天·母侯置酒南教场赏芙蓉》：“莫惜花前泥酒壶，沙场千步锦平铺。将军闲试临边手，按出吴宫小阵图。清露里，晓霜馀，娇红淡白更怜渠。人间落木萧萧下，独倚秋江画不如。”又如《鹧鸪天·再赋》：“艳朵珍丛间舞衣，蹴球场外打红围。小舆穿入花深处，且住簪花醉一卮。秋欲尽，最怜伊，江梅未破菊离披。情知不与韶华竞，回首西风怨阿谁。”

陈耆卿为“永嘉四灵”的同门小师弟，与“永嘉四灵”一样，其诗风实际上影响了晚宋到元初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元中期诗风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江湖诗派”所继承。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谓之唐音。”清人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也说：“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

## 六

陈耆卿才思敏捷，学问出众，自视也甚高。初入馆阁时，由于陈耆卿文思敏捷，加上又是浙江同乡，丞相史弥远对他非常赏识，曾经对人说：“陈寿老确是一位很称职的台谏官，不过太固执了。”并派遣亲信向陈耆卿示意，说史丞相将委他暂代直学士。而陈耆卿却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是不能让人修改文章的。”原来，史弥远